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旨在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中，民族主義這個因素的影響力與作用。而要探討民族主義的影響力與作用，首先必須先釐清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與意涵，從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與情境來分析，是本研究主張的研究途徑。至於，民族主義在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影響力與作用，本研究則透過國際層面:冷戰後中日雙方民族主義互動的現象與中日關係所具有的利益衝突，國內層面: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在中共對日外交中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安全的影響，並進而分析與評估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具有哪些的持續與轉變，研究所得總結如下。

一、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發展與矛盾

本論文以探討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作為分析其在外交中產生作用的起點，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可以發現具有國際以及國內的一些危機因素所導致，此為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被動層面(反應式)的因素，至於主動層面的因素，則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成果展現，所造成民族自信心加強，以及人民對中國崛起的期待。

而從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發展所展現的特色來看，官方的民族主義立場主要針對危機的反應，與中國的國家戰略目標相結合，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動能。而民間的民族主義特色，除了是對於官方立場的回應之外，也更加的具有主動層面經濟發展推動民族自信心的成果展現。經濟發展與民族自信的推動力量，使得中國民間民族主義展現出與過去不同的風貌，民間的民族主義已經不單純都是對於官方立場的正面回應，也具有許多負面的作用，這或許也反映著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一項根本的矛盾問題，就是人民應該凝聚在中國之下還是凝聚在共產黨之

下。

而在民族主義的特點當中一項比較特別的發展，就是網路民族主義的發展，民族主義透過網路傳遞比過去更容易展現出強大的凝聚力量，但是也可能產生一些問題，就是可能使得民族主義的訴求變得更加多元，未來這些多元的聲音，會不會隨著民族主義本身的矛盾擴大，而衝擊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這也將是中國民族主義未來值得持續關注的一項議題。

二、冷戰後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朝向對立發展

首先，從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興起與展現出的特色來看，不論是在政治外交、軍事安全、以及對中國的歷史問題上，都成爲了提供日本民族主義發揮的一些議題所在。在政治外交上，民族主義展現的主要的特色爲在政治上奉行「政治大國論」和「國際貢獻論」；在軍事安全層面的影響，民族主義者企圖通過推動修改和平憲法，調整軍事戰略，期望建立軍事大國；在歷史認知問題上，則顯得缺少反省的誠意，在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的認知中，更是企圖美化侵略之名。

而中日之間的民族主義互動如何走向對立的趨勢，並且影響外交關係的發展，透過博弈分析的方式，可以發現中日民族主義的興起都具有很大國內需求的原因，在政策以及對外關係層面，採取強硬的對外民族主義立場似乎是滿足國內需求的手段，特別是中日之間具有許多歷史上民族情緒的糾結，再加上一些現實利益的衝突，這所產生的影響，就可能使得雙方在彼此的外交關係上都容易採取比較強硬的立場，而形成外交關係的一些困境。

另外，透過博弈分析的角度，也可以爲這些困境的化解提供一些觀點，例如透過博弈的重覆性可能使得雙方產生不同的利益考量，此外就是改變自己內部的認知，這就必須透過加強雙方民間的交流來達成。

三、冷戰後民族主義在中共對日外交中的作用

觀察中國民族主義在冷戰後所展現的意涵與特色，發現其具有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國家安全的影響力，而將之運用在對日外交的分析，並且從認知與事實

現象來評估可以發現，首先在政治層面，冷戰後中日政治趨於冷淡，民族主義在其中的作用為形成雙方心理認知差距的基礎，歷史認知識題則提供雙方一個操作點，以合理化自身政治利益的管道，配合著現實環境的事實佐證，使得中日在雙邊政治關係上陷入困境。

其次，在對日外交經濟社會層面的作用。從中國民族主義在經濟層面展現的意涵來看，它與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與深厚的關連，從滿清末年到改革開放，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目標，不外乎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以及達成富國強兵。但是實現目標的戰略手段與經濟民族主義的意涵，則由於歷史情境發展的不同而有了轉變，改革開放轉變了毛澤東時期自立更生的手段，以積極開發與對外經濟合作的技術交流取而代之，冷戰後面臨全球化的壓力，則加入既衝突又合作的概念，以因應新的趨勢。

民族主義的凝聚力量與經濟現代化相結合，雖然造就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但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同時，社會結構卻也產生了快速的變化，社會結構的失衡與不平，導致近來不斷有群眾抗議事件的產生。民族主義與此社會議題的關連性，就在於民族主義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但是當民族主義在民間廣泛討論而產生不同於官方的論述，並且結合社會上的抗議力量，將可能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產生負面的衝擊。

從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在經濟社會層面展現出的特點，可以發現冷戰後中共在對日外交經濟層面，雖然在貿易與能源議題都存在著競爭的意識與現實，不少學者也開始擔心政治冷淡的趨勢是否會衝擊經濟層面。但若從冷戰後經濟民族主義既衝突又合作的意涵，以及中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提戰略目標來看，中共對日外交的經濟層面似乎能得到比較樂觀的看法，中日儘管在經濟上存在著競爭的認知，但是從現狀來看，中共經濟外交的戰略發展似乎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自由主義者的經濟互賴(interdependence)的角度來分析，未來中日或許

還可以藉著經濟合作所來的利益，而逐漸化解彼此政治上的對立與矛盾。但是中國內部的情況深刻的影響著中國對外政策，也決定了未來十年到二十年世界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中國，中國當前社會不平等結構所造成的不滿情緒相當高昂，社會上反日情緒亦是相當高昂，若是未來這兩種力量相結合，甚至危及中共政權穩定時，勢必也可能造成中日關係將更加緊繃。

至於民族主義在中共軍事安全層面的作用，強調國防的科技化與現代化為主要的訴求，軍事科技的發展也被視為與領土一樣重要的民族利益；安全層面，由於中共軍方為民族主義堅強捍衛者，也因而在政策層面，為了追求軍事資源的擴大，將可能放大對外的威脅認知。民族主義的作用反應在中日安全關係上，由於歷史上的敵意以及威脅認知的擴大，將易於造成彼此均視對方的軍事發展為威脅。但就中共目前自身的認知及定位來說，「互利、互信、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似乎為目前和平發展戰略在安全上的主要依據。因此，中日在軍事安全層面雖有競爭的因素在認知的意識當中，但從現實實際面來說要為中共的民族主義具有擴張與侵略性下一個定論，似乎還言之過早。

四、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義因素評估

評估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可以發現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既有轉變也有持續。從政策的持續面來看，大致是採取鄧小平中日友好的交往原則。在轉變層面，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及民族自信的加強，都是造成中共在外交政策上有朝向扮演世界大國的趨勢，但在各項大國外交當中，較為不穩定的領域就是中日之間的外交關係，目前雖然強調「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為中共對日外交的工作重點，但是在民族主義所產生的一些負面作用之下，中日之間如何面向未來，可能將面臨許多的挑戰。

中共將如何面對這些挑戰，其中的根本問題其實也就牽涉中國將如何崛起以及中國民族主義將會如何發展，還有就是其他國家如何面對中國這些發展趨勢。在探討關於中國崛起的外交理念與民族主義關聯性當中，可以發現中國要崛起一

方面需要民族主義的凝聚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中國要和平，卻又必須排除一些民族主義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目前中共在具體作法上，是透過對外是宣揚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以及合諧世界的這些外交理念，來排除外界對於中國民族主義或者是中國崛起的憂慮；在對內的民族主義議題上則是不斷強調要建構健康與理性的大國心態，至於對日外交的部份則有對日新思維的提出，其實目的似乎都是在排除過於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所造成的影響，以免這些負面因素影響中共和平與發展所需要的穩定國際環境。

從以上的論述，回應文獻探討中 Allen S. Whiting 所提出的三種核心決策圈對於外在環境變化時，呈現出不同強度的民族主義姿態。¹可以發現中共在對日外交政策的層面，是採取肯定型 (affirmative) 的民族主義立場，透過對於中國傳統的肯定以及改革開放的成果展現，以愛國主義的形式來凝聚人民，並期望以此建構一個健康與理性的大國心態。但是由於冷戰後民族主義特色的多元性，民間的民族主義立場，卻同時存在武斷型 (assertive) 與好鬥型 (aggressive) 的民族主義立場。

至於中共如何在此種差距當中尋求一個平衡穩定的手段。首先從比較消極層面，也就是民族主義發展的限制來看，本論文分別從中共國家與社會關係、對日外交新思維所獲得的重視、中共政權合法性、中日民族主義博弈這幾種角度，對民族主義的發展作一個總結，可以發現，目前雖然中國民間與官方的民族主義，在認知立場上形成了一些的差距以及衝突，但是從以上幾種角度來看，中國民族主義要能展現出強大自主性和影響力，目前仍然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當可能衝擊到中共和平與發展所需要的穩定環境時，中共仍然會採取強硬的手段去制止過

¹ 第一種是肯定型 (affirmative)：將焦點完全放在將我們定位為具有引以自豪的特性與成就。第二種稱為武斷型 (assertive)：此種類型加入了他們的概念，並將他們視為挑戰團體內的利益與認同。第三種則為好鬥型 (aggressive)：將特定的外國敵人視為嚴重的威脅，需要以行動來捍衛自己的重要利益。肯定型有助於促進愛國主義以及目標的達成，而好鬥型則會激起憤慨情緒與行為動員，至於武斷型則介於兩者之間。就對外政策隱含的意義而言，肯定形是最低度的反應，而武斷型則是屬於潛在高度反應。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2 (Jun 1995), p.291.

於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而在改善中日外交關係的積極作為上，目前中共除了不斷的強調中日之間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之外，中共也嘗試用一些新的外交手段，像是加強中日之間的民間外交，採取比較積極的作為去改善中日外交關係，以免一些過於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會掩蓋了理性的國家外交需求。

第二節 未來展望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中國近年來民族主義的情緒高張，展現出了不同於以往的發展形式，並且在分別在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安全層面與國家的戰略目標結合，形成推動中國崛起的動能之一。因此，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將是一項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二十一世紀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與發展，或許也將可以成為提供觀察中國崛起或是中國研究的一個視野及角度。

至於民族主義在中共外交中的影響，伴隨著中國崛起，中共未來在外交作為上勢必將展現出更為積極的作風，但是如何擺脫西方歷史發展所形成對民族主義的刻板映像，即民族主義發展後將更具侵略性的思維，將端視中國民族主義與西方民族主義之間展現的不同，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是否會陷入狹隘與偏激的情緒當中。當前中日外交關係之間的隱憂，很大程度即是雙方視對方民族主義發展為威脅的態度，中日目前也都意識到這些問題的負面影響，以及著手改善雙方關係，至於未來雙方發展的前景是否還得在歷史問題當中打轉，亦將是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

此外，就中國崛起議題與民族主義發展的關連性來看，中國目前在政治與社會上，都還處於相對比較不自由的狀態，在這種環境之下，是否能真正的造就出理性具有包容力的大國心態。這個議題對於具有深厚民族主義歷史糾結的中日和兩岸關係來說，都將會是可能影響彼此未來關係發展的重要議題。